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一期 ——
(二〇〇九年十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10b)

【春秋史笔】	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	郑仲兵·李宇锋
【往事如烟】	文革中的华罗庚	罗海鹏
【亡灵祭坛】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谢 泳
【哲人其萎】	叶企孙：鲜为人知的苦难历史 ——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洪 蔚
【恐怖年代】	文革受难者——董铁宝	王友琴
【峥嵘岁月】	原北京女 11 中的文革受难者哈庆慈老师	童 话
【难忘亲情】	羨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刘自立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春秋史笔】

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

• 郑仲兵·李宇锋 •

被采访人：周良霄 顾菊英

采访人：郑仲兵 李宇锋

采访时间：2009年7月

问：二位老师好！首先，我们对您二位以个人的努力，穷尽二十年编著了这样一部文革资料集表示诚挚敬意！这件事，使我们意外而感动，它体现的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的良知，又一次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由此，我们更希望了解关于这部书的幕后的故事。能简单介绍一下您二位在水革中的经历吗？

周：非常感谢能有这么个机会来整理和反省自己的求索经历。我们都是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我研究元史、蒙古史，顾菊英是做宋代古籍整理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为的是要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这是我们当时希望能全身避祸的生存哲学。63年末，我从北大历史系调到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才工作了两年多，批判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就开始了。据说我是乌兰夫向翦伯赞要干部而调来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乌兰夫的小吹鼓手”和“翦伯赞在内蒙古的桥头堡”被揪了。罪状是写了毒草，“吹捧帝王将相”，“污蔑农民战争”。可怜一夜之间，满院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更由于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批判大左派关锋、林聿时关于农民战争的文章，当然是“罪在不赦”。好在我一个平头百姓，无官不党，内蒙历史所号称第二政协，所内比我有问题的人多的是，因此尚构不成重点。71年内蒙干部设在唐山的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处理下放到阴山背后的小荒村，带两年工资，落籍为农，永不录用。

我的落难让我在内蒙古大学的朋友们很着急，设法营救。他们当时正在做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标点，这是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他们就持有毛划圈的红头文件去找区文教办的军代表，要求调我回来参加。这位军代表不明就里，只是疑惑地问：非要这周某不可吗？回答是肯定的。他当然不敢阻格毛交办的任务。于是我便成为插队落户人员中第一例上调的人员，回到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74年夏，批林批孔开始，北京的科教组突然来电话要借调我。他们当时是要恢复《历史研究》杂志，在全国共借调二十四名干部来组成编辑部。大概因我在北京的师友的推荐，这样我又糊里糊涂地到了北京。来了以后，才知道已上了贼船，要当“四人帮”的“枪手”，但想脱身已不可能。我清醒地知道这项差事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我把定写文章时死守按“两报一刊”的调子，争取不犯错误；同时也尽可能表现好点，图利用这个机会，设法调回北京。我苦心营造的算盘竟然走通了，76年，我们全家调回了北京。我立刻通过蔡美彪、黎澍转入了近代史所，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问：从文革结束，到您二位动手编写文革资料，这中间有十三年，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书？

周：我们想搜集整理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的事，原是比较早的。有段经历，使我对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有了切身感受：55年冬，还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读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就想征集点昆明12·1运动的资料，搞个展览。当时，亲历过那次运动的教师大有人在，但是，他们竟然片纸只字的资料都没有留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到文物资料泯失的悲凉。文革中，我们也顺手搜集了一些传单之类，但在这以后的辗转播迁中，几乎又尽数散佚了。86年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后，社会上既感兴趣，又觉得很不能满足。我们认为这除了书本身的架构与内容不尽如人意外，在当时条件下，对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本文革史，当然是困难的。那时有关文革资料大量毁佚的危机已明显出现，在官方有意的安排下，一些小图书馆所藏的文革资料都已悄悄在销毁；个人的收藏也可怕地散失。我们认为对这些资料尽可能抢救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6·4后，趁着我们俩即将和已退休，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作点事，就开始有计划地着手三件工作：一，是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二，是同时搜集整理6·4民运的资料；三，与此同时，由我抽出时间，撰写一本名为《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就中国的专制主义进行清算与批判。三件工作同时交叉进行。

我们认为，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而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而且我们也确实不是研究当代史的，没有条件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我们唯一能作的只有尽可能地保留有关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真实可据的第一手资料。巴金老和慎之先生告诫我们要讲真话，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能把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也就是讲真话。当然，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都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东西，高层的密谋、官方的文档，我们是无法接触到的。这些民间流传的东西也有真有假，几乎无由分辨，但当时确是广泛流传，老百姓都是据此进行运动的。

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发生在大陆，研究在海外。但大陆社会要想前进一步，总有一天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就是为这一天作点准备。退休以后，我们一无所求，二无所争，脱出名利之外，这就可以不计成败得失来做这个工作，努力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来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问：说到“记录真实的历史”，仅靠个人的努力，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真是谈何容易！您二位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

周：难！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依靠亲朋好友的真诚支助。是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做这个工作时，给了我们鼓励和无私的帮助。没有这种鼓励和帮助，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也同时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这项工作是冒着随时有被官方查禁和追究的危险的。

顾：决定编辑整理文革资料的时候，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能编出一部什么样的书，见到什么都以为有用，用复写纸，一式三份，手工抄写。不久，单位规定每人每年可以免费复印一定数量的文件，承蒙众多同事的支援，他们把自己不用的定额，都无偿归我使用，这就解决了复印资料的问题。我那时从未接触电脑，资料录入都是出资请别人做的。

资料搜集、复印、录入都解决以后，主要是整理中的困难。材料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是手刻油印本或手写的复印件。那时纸张质量很差，字迹又潦草，辨认都很困难。而更麻烦的是同一个事件与讲话，有不同的版本；还有很多是内容大体相同，但是又有一些差别，这就有个取舍和校勘问题。但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要按严格标准来做这个工作，根本不可能。只好对完全不同的记录稿，就都收；如两份以上基本相同的，就取记录较多、字迹较清楚的。这个问题这样解决，我是有点遗憾的。但是要对每份材料都校勘清楚，这就要对每件史实都有确实的了解，实在无法做到，只是大体上按原貌梳理了一遍，以供后来研究者使用方便。

在我们搜集史料、校对清样和成书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赞许和支持，碍于形势，我们不能详列他们的大名，只能从心底感激他们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

问：作为治史的行家，您自己怎样评价这部作品？它的现实意义和史学意义是什么？还有哪些遗憾？是否准备做进一步的修订？

周：我们虽是史学工作者，如果说是搞中国古代史，勉强还可以滥竽充数。至于近现代史，不过是大学一二年级时上《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时的水平。谈研究，岂敢！我们不过是秉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对文革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整理和集结，只是在体例上综合和吸收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些成就和优长，尽可能把它编排得合理和方便点，争取作到年经事纬，条理清晰，广采并收，义例严明。我们相信，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帮助的。间或加了点按语，只图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时则是痛定思痛，情不自己，聊抒胸臆而已。

文革资料数量多，很难遍收，遗漏必然不少；内容又十分庞杂，取舍甄别实属不易。这当然决不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所能作好的。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也寄厚望于在这方面不久将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将尽可能地修改补充。

问：您是文革的过来人，又是史学专家，您怎样看待文革这样的历史现象？

周：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慎之先生曾一再指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我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在整理文革资料的同时，着手写《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的。关于皇帝与皇权部分，我曾以《皇帝与皇权》为名，在1999年和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增订出版。但第三部分《传统专制主义批判》，则因大家都清楚的原

因，压在手头，迁延近十年，无法面世。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中国专制主义进行初步的探索与批判，“使我们的民族在现代化的伟业中，能够清除积垢，轻装前进，在民主、进步的坦途上迈进。”（《皇帝与皇权》序言）

在我看来，中国革命不但打上有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是一从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骗局。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已经崩溃解体，明显的不过二十世纪昙花一现的佛光。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是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而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已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试问这个“新”，又新在哪里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这个二十世纪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带有它的时代特点，但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当然是离不开历史上农民革命传统的。这里，我想再引用慎之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着重强调的中国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慎之先生明确指出：“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这个论断给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所领导的历次运动指出了新的更为深刻的方向和课题。游民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他们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去，不着地，萍转漂流，缺乏生存保障的人群，其成份包括地痞、流氓、兵卒、贼盗、乞丐等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任拘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仇视官府，仇视文化和有文化的读书人。他们比起无识、质朴的农民来，见识多，活动力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他们鼓动和组织起来的。没有这种游民领袖的组织领导和游民群众的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个历史传统一直作用到近现代的中国。1927年，有名的被指责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首先由一批流氓、地痞乘机大闹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痞子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这段文字，在文章重新发表时才被陈独秀删除。应该指出，同样的现象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打AB团、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中，都屡屡重演。如卑劣丑恶的人格侮辱，野蛮非人的肉体摧残，残忍血腥的刑讯逼供，捏造中伤的罗织陷害，不负责任的肆意破坏，不计毁灭的死活争斗，对文明和文化人的刻骨仇恨，对亲朋戚友的任意株连，乃至杀人食肉，兽性肆行等等，都是和历史上的游民文化一脉相承的。这种现象在一个号称最先进的革命政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离开了这种农民游民文化传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流氓、地痞所勇敢推行的痞子运动，却让毛泽东大声称赞为“好得很”。这正说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毛泽东和他们是有气性相通的。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

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因此，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应该是更深入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重视。

问：您认为目前研究文革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应该怎么解决？

周：在上面我们说过，如果对毛泽东今天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部文革史是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时十年，波及十三亿中国百姓，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接被整的人高达一亿之数，死人二千万的旷古未有的政治大灾难。然而，毛泽东却若无其事、欣然自得地把它当成自己平生两大伟业之一自许。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政治声誉的最高峰，也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顶点。研究文化大革命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事实，当然是无法得到正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我以为，这正就是一些流行的关于文革的著作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于破灭，这是必然而且很自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人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然而就是复出的邓小平，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

《决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老于心计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

一、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后者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思想智慧的集合。前者才真正属于毛泽东其人，这完全是在进行一个词语的诡辩和玩弄。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好的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不好的毛泽东思想便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文化大革命思想。

这简直是说相声的绕口令，在这绕来绕去的文字游戏中轻轻地推脱了毛泽东的失误，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堕失的权威。这种作法完全把天下人当成了白痴在愚弄。

问：我想插几句。其实，从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到毛去世，一说“毛泽东思想”，都知道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谁曾经认为并且毛本人能否容忍其中还包含别人的思想？而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就是为了证明毛一贯正确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此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博古、王明、张闻天、张国焘固然都错了，此后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也错了，后者的罪名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怎么倒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一去世，自然不再“思想”，剩下的是继承或反对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本身就不存在了。

周：邓小平这样作，当然也自知是亏理的，所以，他才别含深意地对人说，他才是“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的人。可他出于处心维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维护特权专制的用心，却不愿站出来作这个历史的评论，而是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来人作。”这就给我们乃至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谜团，妨碍我们在深刻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上对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剖析，也为历史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缺憾。有了这么个《决

议》，人们再来谈这一段历史时，作为党的纪律，人们便不信也得信，不服从也得服从，文革的研究便只能在《决议》的框框里进行，要想有独立见解和真知灼见的成就确是很难的。

和这种当前研究情况相应的，却是有关批判“四人帮”的书籍向来就不缺乏，这当然是好事。这些著作多少带有通俗演义的成份，有声有色，一度的确是很受人们欢迎。演义利于揭露事实，但揭露并不能代替深层的理性批判。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揭露层面，人们当然是无法满足的。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人发生错觉和误导，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因王、张、江、姚“四人帮”再加林彪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上述的《决议》中就曾明白地流露出这样的企图，想让人们相信：“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这是完全违背事实、不能容忍的。江青自己就供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这是恰如其分的。王、张、姚就是狗的狗。狗的一吠一啮，都是仰着主子的鼻息和意图行事的。放过主子，只打帮凶狗才，绝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如果作者思想上还杂有为尊者讳的顺民思想，用批“四人帮”来代替批毛，那就必然导致对“四人帮”揭发和批判也不可能郑重和深入，这就很不好了。

说来说去，我的意思还是要写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泽东。近来，毛泽东已经从神坛上被拉了下来，但是对他的估计还各有差距。文革十年全盘否定，罪恶滔天，这已不成问题。但由此上推，如何估计？很多人都还是认定建国有功，功劳盖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提出，就是他光辉灿烂的证明。不过，如果像我前面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虚妄、空想的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局”，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又完全不同了。

问：关于这一点，请您略为详细地阐述一下。

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一大业绩，就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建立了新中国，住进了紫禁城，并声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决议》中不惮烦地罗列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增长和成就。单就这些，也许确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业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而在城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

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个别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上的萤光，绝没有什么可骄人的。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一个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三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牺牲几千万同胞，如果是暴易暴，

暴且益暴，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问：有人认为，文革虽然错了，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承认，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为了克服这个脱离人民与人民日益对立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修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阶级与阶级矛盾的论断，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里新生长出来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走修正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它们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然而在生产资料已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如何划分呢？毛泽东完全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提出按各人的思想来划分。然而，思想是个形而上的东西，几乎难以捉摸，于是这个分野最后只能划定在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出现在文革中依其人与毛私人的关系来划线的荒唐现象。公有制和党的特权垄断是官民之间矛盾无法解决的根源，毛泽东就声称要依靠“不断革命”来解决，甚至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便要每七八年进行一次；斗争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进行。毛泽东至死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我认为这原应该是我们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

如上所述，全面深入评价毛泽东仍是一个十分艰巨而炙手的问题。要想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恐怕不是短期所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想写好文革史当然不容易，官方的《决议》在，更是让人们难以措手。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裹足不前，不过比起研究来，我觉得对有关资料进行广泛地抢救搜集整理是更紧迫、甚至最紧迫的任务。因为，毕竟研究是从容论道，后来人尽有时间来进行，而资料的抢救，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史不可泯，失去一份资料，就可能永远失去一份真相。这个工作要靠更广大的仁人志士来多方完成，果如是，则民族幸甚。

□ 原载《往事》第八十三期

~~~~~

【往事如烟】

文革中的华罗庚

• 罗海鹏 •

我们（中国科技大学）651（65年入学的数学系学生）学的是关肇直的教材，叫做关龙，641学的是华罗庚的教材，叫做华龙，631学的是吴文俊的教材，叫吴龙。关肇直和华罗庚有矛盾。关肇直早年留学法国，在泛涵分析等方面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他在解放前就入

党了，他搞的东西虽然很深奥，但是他走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在国防科技上能用上，解决大问题，因此在当时的中科院数学所，吃香的是关肇直，他是数学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并且是中科院党委委员，华罗庚是不吃香的。

（班长）高建国写信给关肇直，约他来 6 5 1 和我们学生座谈，结果他真来了。我现在回忆，关肇直穿着蓝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戴着呢帽，未系风纪扣，感觉上是一个很朴素、不张扬的人。关肇直讲话声调较低，他讲了他在国外艰苦的留学过程，讲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所学的知识要为社会服务等问题，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也一一作答。给我的印象是关肇直待人和蔼，平易近人，讲话实事求是。座谈会的一切都是高建国（也许还有班主任冯玉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张罗的。过后，高建国还是不断地写信给关肇直，保持着和这个权威数学家的联系。

不久，是学校还是系里召开了批判华罗庚的小型会议，也是高建国张罗的吧，我也去参加了，华罗庚也到场。都批判了华罗庚什么事情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高建国不断地起来领着大家喊口号：打倒华罗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

文革中逐渐有了华罗庚的大字报，使我们切实地知道了华罗庚与关肇直的矛盾。大字报揭发，说华说过，有些人一维的问题还搞不清楚，却在研究无穷维的问题。大家说，华罗庚讲的是关肇直，华罗庚研究的数论可以认为是一维的问题，而关肇直研究的泛函分析是无穷维的问题。

没有见到有关肇直的大字报。我们 6 5 1 同学贴出大字报，说 6 4 1 华龙的同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我们 6 5 1 关龙的同学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结果 6 4 1 的同学马上贴大字报反击我们，说 6 4 1、6 5 1 都是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我们班同学自己也觉得理亏，没有敢再和 6 4 1 的同学公开辩论下去。

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华罗庚在王府井某饭店请客，招待科大数学系的业务骨干。结果吃完后华罗庚宣布是 A A 制，让大家平摊掏钱，是龚升还是史济怀还是常庚哲没带钱，很狼狈，赶快向其他老师借钱。

数学所召开了华罗庚的批判会，我也去参加了。记得华罗庚的主要罪状之一是他说，大跃进是蛮干，用数学举例子，说就象是在数轴上向东走 1 0 里，再向西走 1 0 里，结果还是停留在原点上。他的另一个罪状是攻击人民公社，说河北徐水一个人民公社的模范典型是假的，组织他们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去参观，事先准备好，搞出很多假象来欺骗他们。数学所的批判会华罗庚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群众中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赶快站起来，几分钟后，华罗庚旁边的人就轻声叫他坐下。过一会儿，又有人喊：华罗庚站起来，华罗庚就又站起来。几分钟后，又有人轻声说，坐下坐下。

科大也召开了小型的华罗庚批判会。有人说曾经罚他在科大扫地，不过我没见过，我也不相信。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冯玉瑜老师是我们 6 5 1 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微积分课程的辅导老师，他现在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了。批华罗庚的大字报逐渐多起来了，把华说得一无是处。我和（同学）谢韦克私下里问冯玉瑜，华罗庚在数学上到底怎么样？是否原来被吹嘘得过高了？冯说，华罗庚还是有水平的。

华罗庚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都回信给他，夸奖他进步了，鼓励他进一步把数学与生产应用相结合，华罗庚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华罗庚在全国各地奔跑，推广优选法。当时整个祖国大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搞的空头政治。优选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空头政治，使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回到了抓生产、抓技术的正确道路上来。

文革和文革前、文革后的指导思想，要求基础数学研究也要在生产实际中立竿见影地产生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数学的发展。1979年我在科大进修计算机软件课程，著名的大数学家王元来校作学术报告。他说在国外访问，发觉我们的数学研究水平和国外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象费尔马猜想这样的问题，用我（王元）所掌握的数学已经不可能解决了，要解决它可能要靠代数几何这个数学的新分支，在我们中国几乎还没有人了解它，而入代数几何的门，起码要读十几本书。我们（王元）已经年纪大了，要靠你们在座的年青人。（同学）杨劲根后来就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的代数几何。

龚升教授是数学系副主任（华罗庚是主任），他在文革初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了，有一阵子发配到我们学生宿舍来往，工宣队还让我看着他。龚升在被关押期间仍不老实，他不断地讲：在理论数学上作出了新的成绩有什么不好？至少它能象体育比赛一样，打破世界记录，为国家争取荣誉。

对于搞高、精、尖的科研来说，我们国家多年来给华罗庚的环境条件是比较恶劣的，否则他可能做出更多、更高水平的成绩，培养出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生。

~~~~~

【亡灵祭坛】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 谢 泳 •

在自然科学中，我对物理学有一点兴趣，我对物理学本身是一窍不通，但我喜欢看有关物理学家的传记，喜欢读一点物理学发展史之类的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中，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晶永远有热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公正、言论自由等都很敏感，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都有着令人敬佩的见识。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人，很容易除了专业之外不再对其他事物保持热情，但物理学家似乎是个例外，物理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一致的，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奥本海默，还有中国的王淦昌、许良英等人，人们可以不懂他们的专业，但却不能不懂他们这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东西。

我在做西南联大研究时，除了对当时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很敬佩之外，对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也有兴趣，我一直想从他们当中找一两个人来做个案分析，从中看看40年代那些专业与政治无关的教授对政治是什么态度。我首先想到了叶企孙和饶毓泰，想到了他们的死。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40年代还曾做过一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

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踉跄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1968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卷3期）

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毓泰作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见刘克选、胡升华文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

## 【哲人其萎】

### 叶企孙：鲜为人知的苦难历史 ——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 洪 蔚 •

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叶企孙的名字，又重重新被人提起。说他是中国科技基石，一点也不为过，他是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知名学者的老师；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他的学生；他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培养出50多位院士；早在读博士时，他就以论文《普朗克（Planck）常数的测定》把握了科技界的新潮流，而名声大噪。然而，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却在1952年离开清华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1967到1977年间，忽然销声匿迹，仿佛科教界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人。

## ◇ 熊大缜冤案

叶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研究，叶企孙受其父影响，学贯中西。1926年叶企孙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随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后，便在接踵而至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了。

说起“熊大缜冤案”还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虞昊根据钱伟长、葛庭燧等叶企孙学生的回忆。首先编成《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后又据叶企孙本人在“文革”中的受审材料，理清了事件的始末：

抗战初期，吕正操率部北上抗日。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共产党员张珍为吕正操部寻找抗日

知识分子，从事军队的技术后勤工作。他找到熊大缜，熊与叶师商议后，未听从他的劝阻，奔赴吕正操部，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很受吕正操赏识。后又有一批知识分子赴冀中区，为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党内由于革命斗争的异常复杂，易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产生怀疑，组织了所谓的“锄奸队”。熊大缜被“锄奸队”当作特务关押。当时吕正操也受到怀疑，自身难保，无力营救。后部队转移，携带“特务”不便，于是未经审理，将熊处死，并定案为特务。

熊大缜参加抗战后不久，清华大学教师南下转移至长沙，叶企孙从北平来到天津，在天津的法租界组织清华同学会，安排清华教师南下事宜。叶企孙在天津期间多次与熊接触，并用清华大学经费和自己的积蓄协助部队的技术后勤工作。叶企孙来到西南联大后才知道熊大缜被捕，但并不知道详情，更不知熊已经牺牲，便多方打听熊的下落，还来到重庆，想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营救熊大缜。解放后，叶企孙继续多方呼吁，要求为熊平反。这些所为，为叶企孙在文革中蒙冤，埋下了伏笔。

#### ◇ 蒙冤 20 年

文革初期，一开始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熊大缜一直受到吕正操的赏识提拔，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因为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和叶企孙颇多联络，受到叶企孙的协助，便被诬为特务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熊大缜通过叶企孙得到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1967年6月起，叶企孙便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叶企孙突然受到刺激，曾一度精神错乱。

1968年，叶企孙正式被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叶企孙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到了尊严和人格上的侮辱。关押一年多以后，叶企孙被放回北大，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的原则下，叶企孙继续背着特务的帽子，受到打击和监视。

当时叶师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里，腰已经弯到了90度，处境非常悲惨。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背着特务的帽子，含冤去世。

1986年，清华学生写信给吕正操要求为叶企孙平反。

1987年平反文件公布。

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

2001年，叶企孙的传记《中国科技的基石》问世，至此这位中国当代科技的奠基人，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荣光。李政道在回忆他的这位老师时说：“叶先生对我的教导，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 ◇ 严格而又慈爱的老师

《中国科技的基石》作者之一虞昊，也是叶企孙的学生，在亲身体验与多年的调查中，他还还原了一个完整的作为良师的叶企孙。虞昊说，他认为，没有叶企孙就没有今天的李政道。李

政道入学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论课了，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虞昊保管的资料里，有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虞昊说，当年李政道的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

虞昊回忆说，叶企孙不善言辞，给人一种很严厉的印象，而接触过他的学生都对他非常敬爱。虞昊记得他刚入学不久，全班30多位学生就被叶师请到自己的宿舍小聚，在聚会上叶师逐个和学生谈话，了解学业和家庭状况。有个高个子同学家境不好，衣服都破了，叶师对他说：“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后来，“找叶先生去。”成了学生们遇到困难时常说的话。

有一年暑假，王淦昌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师知道后，找到他说：“我给你钱，回家去吧。”叶企孙终身未婚。虞昊与叶老的侄子叶铭汉根据一些情形猜测，叶老曾一度倾心于他的寡嫂，大概是迫于礼教，这段痴情没有结果，叶老便终身不娶，献身于科学理想。

#### ◇ 清华哲人

本书的另一个作者黄延复，多年从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入校时，虽然叶先生正在以“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校政，但严格说，他并未亲聆叶先生的教诲，然而他说叶老一直是他所景仰的人。一直从事校史研究的黄延复，从学校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先辈们研究后，把知识分子分为五个层次：圣、哲、贤、儒、士。他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只能算做士，普通读书人而已，而在他看来，叶老则是一位在清华历史上少数称得上“哲人”的人物之一。许多人为叶老的含冤叫屈，黄延复说，没有那段苦难的岁月，我们无法了解叶老的人格境界，也就看不到他修养的完善。黄延复说，从叶老受审的交代材料中，也能看出叶老的哲人品格。叶老在一篇交代材料上这样写：“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只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

叶老从监狱放出后，住在斗室中，从无一句怨言。朋友来看他，想听他诉说遭遇，他从书架上取出《宋书·范曄传》读了一段范曄在逆境中的自述，以表白自己的心境：“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细知。”在这种自述中，叶企孙的人格、品质和哲人风范，达到了一种圆满的境界。

#### ◇ 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最可贵的是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据虞昊介绍，这些资料来源主要有三。

90年代初，虞昊在为建立叶企孙奖学金筹集资金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叶老早年的学生、朋友，像钱伟长、王淦昌、钱临照、顾毓琇等约50人，并邀请他们写下了纪念和回忆叶老的文章，以《一代师表叶企孙》为题结集出版。他们对叶老的回忆是了解叶老的一个途径。同时，虞昊还结识了叶老的侄子叶铭汉，由于叶老无儿无女，叶老的日记等遗物，均由叶铭汉保管（其中包括李政道的试卷），叶铭汉慷慨地将它们提供给虞昊。

最珍贵的是，北大为虞昊提供的叶企孙在北大受审的交代材料。这三方资料组合成了叶老的一生。

出于对叶老的敬爱，黄延复曾在《航空报》上发表《万古云霄一羽毛》一文，纪念叶企孙。复旦大学出版社见文后，向黄延复约写叶企孙传记，黄延复由于自身不懂物理学，便找到虞昊

合作，两人的长处加在一起，便有了这本《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在采访中，叶铭汉谈起阅后的感想说：“这本书写得挺好，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贡献，为知识分子讲话。”叶铭汉是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现已退休。

美籍华裔学者、叶企孙的好友、曾与叶合作创建清华大学工学院的顾毓琇，对本书则有更高的评价，他说：“此书可以传世。”

□ 原载于《科学时报》2001年3月23日读书周刊

~~~~~

【恐怖年代】

文革受难者——董铁宝

• 王友琴 •

董铁宝，1917年生，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1956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在北京大学28楼“隔离审查”。1968年10月18日从28楼出走，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吊死。

董铁宝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取得力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到中国，任职于北京大学。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5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记载：

“1956年11月7日，校刊96期报导，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博士廖山涛，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他们回国，是因为周恩来有信送到美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那是1956年，比较宽松的一年。1957年夏天就进行了“反右派运动”，董铁宝没有成“右派分子”，但是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数学力学系曾经专门组织学生开会“批判”他。那时参与批判他的系中当时一位青年教师告诉笔者，他听说“批判会”后，董铁宝在家里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反复咬自己的手指头。这位老师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很感惭愧。

他回国十年以后，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化、最为严密、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活着走出“隔离审查”室的几位北京大学的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一棵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的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刑罚是大量打耳光。

董铁宝的妻子梅镇安在生物系工作，也被“审查”。梅镇安的哥哥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被指控为他们的“同伙”。1968年10月18日傍晚，他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董铁宝死后，他的“专案组”中的一个人，还神秘地绘声绘色地向系里的人说，董铁宝到那个地方自杀，其中有很深的原因，因为那个地方靠近他妻子的哥哥的工作单位，他一定是试图和大舅子取得联系，没有成功，等等。“专案组”的人对董铁宝之死毫无同情。

董铁宝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和女儿当时是中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作为所谓“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后来董铁宝的妻子写信给周恩来，说明他们如何从美国回来，请求给予照顾，把她的儿女调回到北京。她的信起了作用。当其他同龄人依然远别父母在农村时，董铁宝的两个孩子回了北京，这就算是当时因“归国华侨”身份受到的“优待”。这种“优待”的相对值不算低，但是其中的绝对值当然很低。

关于董铁宝，《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的记载是：

1968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没有写他是怎么自杀的，也没有说他当时被“隔离审查”。这样，他的死就显得相当含糊不清楚了。

校史写作有另一条未言明的规则：对于北大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自杀的教员，只记载教授，连副教授都不记。董铁宝的名字在校史上，与董铁宝同系的教师董怀允和陈永和，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可是他们的死亡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不见一字记载。陈永和的死离董铁宝的死只有三个星期。

□ 原载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

## 【峥嵘岁月】

原北京女11中的文革受难者哈庆慈老师

• 童 话 •

原北京女11中的文革受难者、体育教师哈庆慈老师受难已经快要43年周年了。她的遇难日期是1966年8月27日。但是她的遭遇至今还没有被报道和记录。

不久前，原女11中的老校友有一聚会，大家回忆起这位1966年死于红卫兵暴行的老师，都觉得有义务把这位的教育工作者的有关资料记载下来。

笔者把能找到的资料汇集了一下，大致如下：

### 1，履历中的记载：

哈庆慈，女，回族，未婚。籍贯：湖北汉阳。父亲：哈汉章。生于1915年10月8日，1966年8月27日去世。193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解放后，在北京女11中任教，是体育教研组长，二级教师（又一说法是一级教师，但是履历写为二级）。

2，报章上的相关资料：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第一版《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授奖大会授给起义人员韦大卫等三人奖金》一文中报道：“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学教员哈庆慈在会上说，当她每次看到报上发表蒋军空军起义归来的消息，就希望回来的是她的亲属。她希望在台湾充当蒋贼空军军官的哥哥哈虎文、哈郁文和姐夫王健珍，都能听到今天晚上欢迎韦大卫等的欢乐声音，而知有所选择，不要再沉沦下去。”

3，女11中校友贺秉楠在《马大人府与女十一中》一文中的回忆如下：

哈先生，回族，论相貌说实在的，有些不恭，她脸色黝黑（整日暴晒之结果），嘴还有些歪。确有其貌不扬之嫌，却有颗金子般的心。为了发展学校的体操事业，创体操专长校，她不惜把家中的犹如房间大（大约十几平方米）兰白花图案的纯羊毛波斯地毯，搬到学校，供学生练自由体操使用。这地毯到现在也是价格不菲呵！更何况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能换回多少贵如黄金的粮食呵！她的业务精湛。在体育界闻名遐迩。是全市仅有的几位团体操编舞之一。她虽终生未嫁，却有着慈母般的心肠。她对每个学生都平易近人，慈爱有加。一次，我因不谙事故，口无遮拦，招惹了一个学习上不务正业，但在整人上颇有心计的同学在班会上对我的攻击，批判。气得我有口难辩；哭得我天昏地暗，谁也劝不住。此时，恰逢哈先生从教室经过，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以后你的路还长着呢！这点小事又算什么呢？人谁无挫折？挫折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经过挫折的人，才能经得起任何暴风雨的考验……”哈先生的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受用终身，至今仍刻骨铭心。

4，2008年北京奥运的前夕原女11中校友在博客中写道：

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明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而在这时却单单想起我高中时的体育老师哈庆慈。我上高中时，她在我的眼中已经很老了，一点没有一个体育老师应有的健壮体魄。她身材瘦小，说话嗓音沙哑，长相不敢恭维，有点儿符合我童年时的女巫形象。但……这个人不可小看，不但在校内很有威信，也是北京体育老师中的元老和权威。她多次参加大型团体操的编导，是一个善于判断，果决，坚毅的人。……可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却在文革中被她的学生凌辱折磨致死。那时，她被剃了光头，被勒令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打扮成一个妖魔鬼怪的模样，然后做着规定的动作，唱《我是一个牛鬼蛇神》，唱到最后一句“让人民把我砸碎”，还要双手砸自己的头。被多日关在牛棚的老师，因有人提出要洗一下脚，结果被勒令脱下袜子，让老师互相叼在嘴里。我还听说，给老师吃的炸酱面是用屎做的酱。记得有一天，我来到学校，听说哈老师死在学校，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但这只是传言，只有当事人知道，可至今没有人说出真相。

5，哈庆慈的学生和女11中老教师回忆：

哈庆慈是在学校里（1966年8月27日）被斗争折磨，被迫光脚围着火堆奔跑，最后终因不堪忍受凌辱，从学校里后排楼的四楼跳楼，当场死亡。同时期跳楼的还有一个非教员，工友，男性，姓名不祥。与哈庆慈同时被斗争折磨的有女教师邓宛湖（音），女校长张艳筹（音）。红卫兵的头子是高三学生曾海生（女）。

6，哈庆慈的亲戚回忆：

……因哈庆慈女士是回族，按照民族习惯应土葬。但其时，少数民族政策已被停用，还未

恢复，哈庆慈女士的遗体被其所在单位当时的负责人送去火化。一周后，回族土葬政策恢复。哈庆慈女士生前还资助过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遗憾的是，当年迫害哈庆慈女士的红卫兵中竟有被她资助过的学生。

原女 1 1 中的老校友对暴行、对施暴者、受难者都没有遗忘。大家通过努力，找到了哈庆慈老师的照片一张。

注：北京女 1 1 中现名北京 1 6 5 在中学，校址依旧。

~~~~~

【难忘亲情】

羨君应召天上去
——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 刘自立 •

墓木已拱。

这是父亲刘克林的一些老友怀念父亲时的一句老话。父亲的遗体已星散云逸，无“墓”可居。但是，他的灵魂是否确在，本来就成问题。所谓梦魂牵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是一种沟通状态。

近读诠释玛雅人文化书，知若有一种储藏“两界信息”的水晶球、水晶头骨一类异物，当可通过自我湮灭，复观前人之亡魂，且可与之对话，即可知死亡之谜，也可以此窥知未来之走向。只是不知这种神秘主义对于我们东方人有无效应。

几次“托梦”，都见父亲立于灰朦之中，不言不语，且时常与我对视一阵，复而转身退隐，消失，暗淡。而我则在梦中有重见父亲之大惊愕，却又不可能大叫一声“父亲”，就那样一次次见他显像而归隐。人是极度忧郁、晦暗和悲戚的，是中国人所谓冤魂之形状吧！这种“生”亦如死，死亦如哀歌的场面，证明父亲去世 33 年（此文做于七年前，今有修订——自立注），虽墓木已拱，时日悠久，但在超时空的存在中，精愀决定的“几维”空间，仍有冤魂期待活着的人，做一次轰然之弥撒，以告慰他仍在流血的心。

父亲走了。在 1966 年 8 月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梦中太忧郁的父亲，与父亲友人们谓之诗豪、酒豪的誉称，实在是阴差阳错，天上地下。

1977—1979 年，在两次追悼会期间（一次是叫做“骨灰安放仪式”，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隔几年，又有中宣部六位“文革”落难者的正式追悼会，耀邦同志莅临以悼）都有送悼诗、文的。李慎之先生的两首诗含批判于悼念中，是十分之所谓“热辣”的一种。

一首为：“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羨君应召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

“握杀刀”一句，出自廖仲恺的诗，“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年，胜似屠门握杀刀”。（1922 年，廖仲恺遭陈炯明囚禁时写下《留廖内子》一诗，与何香凝别。）这里面储存的两大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父亲本为性情中人，有诗酒随情，豪迈爽朗的气质，也不可说没有恃才傲物之性格，所以是诗豪酒豪，既为尊誉之名，也是描写之状。“握杀刀”，则是慎之先生之尖锐的批判。其中缘故，十分深刻。

父亲一生为报人，为写文章人，但后半生一直做“御用”文人，写过大量文件，其中主要的是参与中央反修小组的《九评》写作。而慎之先生作为父亲燕大的同学，“战友”，都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父亲尚为一届主席；当然了解他年轻时代的理想或理想主义。但时隔半个多世纪，《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论基础，（见《环球时报》），却是父亲本不可能预料的。一个被“文革”夺走生命的人，其最后之精神与“文革”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二首，“十年无处哭孤坟，面对空椁搥泪痕，青山何处觅骸骨，可怜功狗党恩深。”

“功狗”之谓，其实也深。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的，党是要给予一定的精神或文字肯定的——当然含李慎之本人。几百万、几千万怨魂，或为“功狗”，或为无功之狗，却似乎都难以上升为“人”，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色彩。此话出自汉高祖刘邦，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9年，中宣部为六人举行追悼会，场面宏大，人头攒动，“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都站在礼堂外面。当致悼词及父亲时，念到他死时42岁，对其一生的“功”劳，全场发出一阵轻雷般的叹息，使追思之情凝固为一种戚戚之物。我全身颤抖，全力抑压自己的感情。弟后来有文章说，母亲瘦弱的肩膀在哀乐中剧烈抖动，但她也在压抑。（只是在后来父亲一友人的另一次追悼会上，母亲因抑力失控，忽大哭而晕倒。对于灵魂的哀诉，是无时日的选择吧！）

站在默立于追悼会场的人群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但记得父亲的遗像亦显出郁郁之情。我们本来是选择了一张他在国外开会时的照片放大。他那时身在日内瓦，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团长是陈毅，时间是1962年。后换了一张可能是档案照。细看此照，已浮现出父亲忧郁的一面，与我在梦中所见相似。这是灵界对他的一个选择吧！不久前，我亦赴莱蒙湖边。所寻父亲踪迹，烟波浩浩之中，似得亦非得冥冥之告。

从记忆看，我倒并未看出父亲生时有多豪爽，豁达，或有多少内向，郁闷。可能是我的年龄尚小之故。只是他去世后，他的同学、同事、老友在告知父亲生前事时，有这样两种判定。一种说法是，他从《大公报》转至中宣部后，人变得忧郁了。唐振常先生持这种见解。我寻此线索觅忆，似确乎如此。其实，父亲的工作地点多在钓鱼台，很少回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

60年以来，社会极“左”思潮弥漫，渐成气候。在此思想核心地位的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个中的波谲云诡的局面。父亲当然是“紧跟”这种形势的。我在中学生活之中，关心政治，阅读政治读物、看报纸、看杂志，已成习惯。但政治形势发展之快，本不是我们这些少年追得上的。连父亲本人，也有一时难以理解之处。记得有一次与我们容膝而谈。他问到我们几个，谁可以讲出林彪的“四个第一”。五兄妹中，只有大姐悉数以答。而我却贸然反问父亲，何以理解“四个第一”的内涵。父亲听后，却也一时语塞。

父亲本非“老革命”，以他当时的处境与“政策水平”而言，林彪到底要做什么，当然几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我一向远骛马恩原著，懂不懂，都有崇拜之心，父亲对此是不甚满意的。又比如，那时，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回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喜形于色；但父亲看过亦无表态。想来，此书中对于托洛斯基的肯定与誉词，已难于使他做出表态与评析。从这种忧郁与疑惑，尽管无法探究出他到了中宣部就变得忧郁的原因，但是，亦可见出一点蛛丝马迹罢。其实，到中宣部这个地方，于父亲一介书生，党龄尚浅（他是在50年代“重新入党”的）的身份，实有陌生感。对比中宣部的老延安们，本是“格格不入”的。

大姑父在80年代与我交谈时，就回忆过。他说，他劝父亲，要干，就要“加入”，不然，就很尴尬。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好在他是搞国际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与他在《大公报》

时期，以一介书生，“文人论政”时相比，已入“城府”，年龄也从青年转向中年，沉重的文化负担与政治负担，或许在情感与人格上开始了对他的扭曲。

以至他常常对我说，他愿意搬出这里，到北海邻近，购一小院住。他对我说，长大后不要当什么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去学个木匠为生。住在中宣部的宿舍里，邻窗可见树木一片，他有时发议论，说：“看，我们像住在山上哩！”这都是他从事紧张的文字工作之后，在闲暇时对于超然之境遇的祈求，只是没有真的去躬身践行而已。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是经历过1957年、1958年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以至最终看到了“文革”的序幕。仅从少年时代与父亲“交往”的我们而言，直到今天，才见出在中国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面临过怎样艰难的选择！若非立场稳定，对大事件之厄运多少采取了片面与回避的态度，是不能遴选为思想核心班子的写作成员的。父亲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切，我自无从得知了。当然，生活的演变与转折，多为渐进，少为突变。起码，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日子里，父亲也有过一些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大笑开杯，心无多虑的时日，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日子。

我的舅公唐汉三为候德榜的助手，为化工界元老。他在京时，逢其五、十生日，都要庆贺。记得50年代中初来北京，就在北京饭店聚餐为舅公过生日，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60年代一次，是在四川饭店。记得父亲酒喝了不少，谈兴甚高，红光满面，留下他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以后，我又在王芝琛先生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的公子），见到40年代末期父亲与其他《大公报》人的合影，英姿健硕，爽爽自如，没有丝毫悲郁之情，也是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但这种愉快，在我们一家搬至中宣部后，确实并不多见。

父亲的工作使他有幸迈出国门。足迹遍布欧亚非几块大陆。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大公报》（上海版）之命，赴朝采访朝鲜停战谈判。涉及劝说志愿军战俘回国的报道。他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记者团中，文章尤见精彩的。常常是晚餐酒后，于深夜将长篇报道一挥而就，传至编辑部发表。后著《东场里血案》一书，由《大公报》出版。从朝鲜返回上海后，他受邀在沪各界会上做报告，一句开场白：“朝鲜战场形势十分严峻！”引来听众们的关注；以至几十年后，尚有人提及。

1962年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后，他以一篇《看！莱蒙湖这面镜子》名播于世。后与人合著日内瓦通讯集。1964年，又随周恩来总理赴亚非阿（阿尔巴尼亚）十四国访问。届时，他已调至中宣部国际处。

总理出访中事，我知之不多，仅从近年面世的一些书籍中见到少许记载。从十四国回来，毛亲赴机场迎接，也使父亲十分感动。他的情绪似被这个场面吸引，海外诸事，早已放在脑后。那时，弟妹有幸到机场迎接，要了一辆小车。这车子已不同于父亲用过的，《大公报》那辆王芸生老社长的老爷车了。（又，记得父亲从日内瓦归来，叫我到家在附近的街上等待。不一会儿，一辆新华社的敞篷汽车飞驰而至。车里坐着几个年轻的记者。父亲从车上下来，神色轩昂。）

从机场回到家中，父亲尚未休整，旋即叫我们随他一起去北海公园。每次出国归来，他都有一种更加眷恋祖国之情。他还为我们吟唱陈老总（陈毅外长）在访问非洲期间所填的《满江红·黄金海岸》一词：“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此，两洲血。”

反帝反修，自然是父亲出访的大使命。但那个时期的人们，如何能够冷静如现时。另眼看待“资本主义”世界呢！日内瓦湖的卢梭岛百年如旧，但对于父亲，对于我，在心理上已是两

般景致了。

一如新中国的外交官与记者不可能造访美洲与西欧一样，父亲的足迹最西，恐怕就是到阿尔巴尼亚了。恩维尔·霍查的形象，在少年人如我一辈心目中十分高大。

另外还有在“古巴西，洋基诺”喊声中浮现眼前的卡斯特罗。石方禹先生那时著诗《古巴革命及其他》，是我十分喜欢的作品，常常朗读。父亲也表欣赏。他的心目中，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是十分令人激动、崇仰的事。当美军在猪湾试行登陆时，父亲以严肃的面容，告知我这一消息。虽然，我那时不过是个小学生。

我当然不知道，父亲的家中，他的二姐在台湾，后去美国。生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中的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四十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巨大转折。的确，父亲把身心托付给那样的一个“事业”，他也不可能有暇思考事物的另一面。然而，这个“另一面”，本是十分客观，十分严峻地存在着的。这个客观就是，毛的内政在历史中将其真相呈现的时候，却无人能够或者愿意将其外交，联系之，加以呈现。这个现状现在正在改变着。

我们从零散的史料复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外交本身，已经无法逃出毛的世界革命，而归于独善其身之局面。父亲同学李肇基死难于克什米尔号爆炸。近来，他的亲戚自费印刷了一本没有书号的非正式出版物，以寄托哀思。李肇基和万隆会议罹难者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疑问——何以在知情蒋介石方面的特务动作后，还是让李等前往香港启德机场登机，何以周等可以改赴昆明……！

这个事实许多作者提及；但是由李先生亲属提及，尚属首次。

具体的事情如此，大局的判断难道不是如此吗？毛的对外战略，一是人肉付出，几百万所谓志愿军弃骨朝鲜，换来的是什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带来格瓦拉和波尔布特一群屠夫！二是金钱付出。1957年，他就可以付出四十亿美元，买赫鲁晓夫的原子弹（见张戎《毛》）。当人们以为反美是一种永恒真理时，毛由于内外交困，他抓住时机，小球改变大球，把反美改为泛美，泛日了——而美国，正好是在这个集权政权最为危险的时候使之化险为夷——这个化险为夷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中共而言，正在化为崛起。

诸如此类，我们是后知后觉，不去多说了。我们其实还是蒙在鼓里，父亲的反美，是怎样一种扭曲和冲动！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姐夫曾劝告父亲去美留学，被他一句“我只对中国有兴趣”而冷拒绝。如此一来，父亲的远足，其基点，当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兴趣”之上。也许，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且都越洋出海，放眼世界。只是这种“爱国”之内涵，南辕北辙，天壤有别。

八十年代中，据远在美国的我的姑母信中所述，我的爷爷刘光柱本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此局原为严复主持）。后又办《海事》、《四海》两本杂志，也都是因他留学日本，对海外之事有所了解。“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土肥原贤二邀爷爷与其共事，被拒。爷爷遂返回湖南新化老家。爷爷虽为刘步蟾之学生，但依父亲的话，“一生纸上谈兵”，没有真的率军打仗。但他的民族气节是赫然明在的，不可能与日寇为伍。父亲少年时代的学习，多是在他二姐的指导下进行，当时我家在香山有一处别墅，父亲的唐诗宋词，许是在那个“天方夜谭”般的环境里“派生”出来的。以后，他二姐以二十岁多一点的年龄，携他的表弟（或堂弟）等，如以后成为希腊文专家的水建馥等，同舟赴四川，一路坎坷波折。

父亲的藏书里就有《旅顺口》一著。当时的我，自然不谙国家——大家，与我小家之历史的缘故；他还带领我们全家去看电影《甲午海战》，我们一群小孩被邓世昌的英武殉难而感动，却也不谙其中大家与小家之历史的缘故。父亲有一次与我们大谈夏完淳，说他如何痛斥明奸洪承畴。忆及那次叙史，至今历历在目。几个月前我获购夏完淳《大哀赋》一书，把夏完淳大骂洪承畴一节择出朗读，其时，父亲的影子似于云间重现而笑。是的，为了追回父亲的表情，感觉，乃至他的谈吐、朗读之节奏、语气、神采，我反复诵读了下面的段落：夏在明知洪氏为汉奸后用反讽口吻说：“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本朝有个大忠臣洪亨九先生，是在松山杏山之战殉难的。崇祯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我常常佩服于他，想学他的榜样。我虽然今年只有十七岁，难道杀身报国的精神，就不能追步洪先生吗？”洪氏闻之，哭笑不得，闭口无语。（见《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南史撰）

南明文化培育的“遗民”情结，在五六十年的父亲身上绝不可见踪影。只是我以后细读了陈寅恪的晚年诗文，暨余英时先生80年中的析读，争鸣文章，方才了解陈寅恪大师何以要写钱牧斋与柳如是。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

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父亲以叛逆之身于1939年他14岁时加入共产党，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之介绍下，在一国民党将军的宅邸后院，宣誓入党。但以后，党与之断掉了关系。“党文化”之压力一直在压迫他。固然，《大公报》或燕大时期，他尚有正面的追求，“文章报国”也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好，付诸行动，主持各界人士抗日集会，参加游行，编采文章，高涨政治热情也好，一如他的老同学所说，要“至上”，也好，都反映了父亲的理想主义者的襟怀。虽然，今天，现中宣部已承认了他起自1939年的党龄，但从精神到肉体，这一追求已经灰飞烟灭了。

豪爽的父亲，应了苏曼殊和尚的诗，“纵有欢肠冷似冰”。我常想，若父亲生前一直以“冷似冰”的态度，处理任何事务，他也就会和许许多多曲直如常的人们一样，从牛棚马棚里走了出来，还可能官升一级，半级的。但细细一想，这就不是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狷介耿直、文坛旌旄的刘克林了！

1964年，在北京播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那一刻，父亲随着播音员齐越的声音一起朗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父亲已去，确是无可奈何。理想主义的时代是否会相识而归呢？

文坛中人在讨论中国现状，评析文化衰亡，物欲嚣张而伦理堕落的今天，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信息时代，有一点点理想的、浪漫的、非实用主义的影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然而不管父亲当时如何写其九评，也不管当时的九评班子中人如何评价九评于今天，九评中的两大因子，一是社会理想说，一是爱国理想说，是生长在当时的“写手”们的脑袋里的，大致没有疑问。在经历或批判了“文革”的本质以后，人们仍然难以分辨革命与假革命，宗教与伪宗教，文化与文化赝品之间的界线，断头台，大屠杀，烧毁书籍，告密揭发，当面是人，背后做鬼，

为主而杀人，刑讯，如此等等，都是不分革命之真假的。当人们不了解这一层，他们就陷入了“目的论”中，而忽视了把“手段”当成了过程的全部劣行。九评中人，在当时就看透这类“革命”怕几无一人。

我曾试图采访钓鱼台反修小组的成员，但这些老伯们都认为写出这段历史很难。一种就是，九评的评价问题。“上面”说是“一风吹”了……这种“一风吹”是个什么东西，与历史、政治和文化虚无论有何判别？再就是，不好调当时之档案。据云，钓鱼台中人，是一张纸片也不能拿出来的。七老八十的人，空凭记忆，当然写出来也不准确。

《九评》自然不是个人的结果。康生管得不多（他是中央反修小组组长）。邓（小平）管得多，常来钓鱼台。文章修改主要是胡乔木。有时要改几十次，以至与初稿面目皆非。其中一老伯告我：我和你父亲是起草头稿的两个人。我听说王力自吹九评中的某几评是他写的，完全是胡说。

这样，我就大致放弃了通过采访九评中人而跟踪父亲的念头。尽管，我以后又获得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史料，遂使评介《九评》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过灵媒与父亲对话的话，那么，他在职1966年的最终选择，是投了他人生的弃权票的，其中包括对于《九评》！

再如果，我可以潜身于父亲的灵魂，在撇开了“或生或死”这一人类中心论的狭窄命题以后，我们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回顾发生在历史上的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镜头要切换至1949年的香港。也如我二姑母时隔40多年，在美国来信中所述，父亲与其二姐，在香港，在北平被大军所围时发生的一场争论。当时许多亲友俱在，如我大姑母，大姑夫等等。父亲忽口出直言，谓李文（国民党兵团司令，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黄埔一期学员，北平卫戍区首长，我二姑夫，）应当放下武器，以免北平人民生灵涂炭。二姑复，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可以指示他这样做。随后泪下。众人都谓父亲无礼。

这是时代两极决斗中事在一个家庭中的反映。1949年后，李文事一直困扰着父亲。1954年万隆会议，本是邀父亲前往的，也因父亲在采访“抗美援朝”时报道有功。但因有李文这个“关系”，未能成行。有父亲老友当事人忆及此事，当时乔冠华说过，李文！？有什么关系！“文革”中父亲也许又交待了他与李文、其二姐“划清界限”之事。

所有这些枝枝节节，为少年时期的我们所无知，所不解，但确是压在父亲身上的“大山”。《大公报》时期，从容不迫1940年末，就有了自由主义之呼声。其中几篇社评大声疾呼，明辨于此。虽然作者每对此三缄其口。但父亲、唐振常等年轻的大公报人，还是希望《大公报》“新生”的。

40年代，父亲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为标题，鼓呼支持学生民主大游行。此题中“正正之旗”，是黄梨洲“始有堂堂正正旗”诗句衍化而成（见《南雷诗历。偶书》，1917年。）可见“左”的思潮已澎湃击岸，闻之有声。也许，这也是“新生”的海燕来了罢。虽然这种“新生”实发展到名存而实亡的地步。《大公报》中左右两派名记者中，到了1957年、1966年，大多难逃厄运。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

苟且活下来，也是伺之一隅，如朱启平，一篇《日落》，驰名天下，死时，却只有香港《大公报》发一短讯，几十字而已。

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位很单纯，甚至很单调的报人。他每每上夜班，写文章，后来屡屡出国，也是做文字匠。有传说，在非洲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汽车上，受陈毅外长之命，他以膝为案，一次草就的文稿，使陈满意异常。遂有“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这一陈的说法，父亲为文也快，也精彩。是受了王芸生等一批“一支笔”写社评，写一纸，会印一纸的倚马之风的影响吧！

在钓鱼台，他当然也是以“快”为优势。他说，钱大校（砥千）是绣花笔，虽慢，却文章打磨，十分漂亮。一次，他为我们子弟朗读关于朝鲜“千里马”运动的文章。读后，索问感评。我贸然以答，其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此段最好。父亲听后朗声而笑，说，那是毛主席的话嘛。

不要否认，在他投身其中的，带有“左”的色彩的一系列宣传鼓噪之中，可见其文笔的影子。以至他在喝醉酒后，会忽而问我们——“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啊？！”那时，我们都已惶然，如何革命到底？学雷锋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我从小即爱读书。对于列宁、罗伯斯庇尔、乃至涅克拉索夫，都感好奇。父亲藏书，尚有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但他对我们的这种“西北”的苗头，每评以“好高骛远”，要读中国人的书。虽然，我亦记得他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曾援引过爱伦堡，1964或1965年，父亲也购买了“内部读物”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哈恩、内夫编辑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泰勒的《音调不协调的号角》。然而，“新思维”给父亲带来如何的影响，我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了。

当革命之“水至清”的局面，在我朦朦笃笃阅读《厌恶》被搅混以后，大悲剧的序幕正在拉开。从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长、父亲的顶头上司姚溱自杀以后，父亲的精神已开始变做游魂。他寝食不安，茫然四顾。记得家中常没人照顾他。母亲远在宁夏“四清”未归。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父亲终日失眠，在屋里不断踱步，苦思以虑。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缕。

父亲给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对我说，“凄风苦雨啊……”

我自然不解其颐，因为未成年。他何以把工资给我！（保姆自然已被遣走。）以后，至黄昏，事情终于发生了。父亲从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坠楼而下，撒手人寰。几天后，母亲从宁夏归。

陡回家中，她一进门便问，“爸爸呢！”母亲那双眼睛的光，对我们而言，是永恒的！

虽然关于父亲“自杀”或“他杀”是一个谜，何况又是在康生手下工作……但是，理想之厦的倾覆，对他而言，已成铁案（更有不幸，妹妹识一高人云，父亲的亡魂未行超度，仍在大森林中游弋……）

也是二姑母信中，曾述爷爷在台北无疾而终的安详一幕。那时，爷爷向来早起在庭院中散步，继而促孙女（我表姐）上学。那天却未见人影，急去卧室探视，只见老人家安眠枕上，头略偏重，似有异样。呼唤把脉，全无反应了。当时枕被齐整，晨曦在照，满室祥和。那是1955年10月20日。

谁能知晓。十年以后，他的惟一的儿子，排名老八的父亲，却在怎样一个“凄风苦雨中”“应召天上去了”。

爷爷有诗词留下。是我在广州沙面大姑母宅中所见手迹。抄录如兹，供对中国海军史，继

而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士欣赏——

“梦里家山，病中岁月，一年容易中秋。暗影清云，嫦娥深锁琼楼。问天明月几时有？奈今宵，掩面遮羞。莫思量，世道茫茫，人事悠悠。

悲秋不尽骚人事，看西风萧瑟，总惹新愁。况属流亡，异乡风雨淹留。残躯未了终多幻，待年年，马角生头。最伤心，大嚼屠门，说返神州。”

父亲是不会知道爷爷的“终多幻”的心思的；爷爷当然也是不会知道他儿子“终多幻”的心思的。大幻象今归同一，梦已圆缺吧！但愿其父子能在地下相见，相谈，消弥误会，爷爷有一句话，叫做“如若我回大陆，我就没有儿子；如若我不回大陆，我就没有家”。悲从中来！绝望之至！

□ 原载《民间历史》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